

中華書局

榮新江 著

歸義軍史研究

——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華學術叢書

榮新江 著

歸義軍史研究

——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榮新江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3
(中華學術叢書)
ISBN 978-7-5325-6994-6

I. ①歸… II. ①榮… III. ①地方政府—研究—敦煌
縣—唐代 IV. ①D69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195823 號



責任編輯 蔣維崧
裝幀設計 嚴克勤

中華學術叢書

歸義軍史研究

——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

榮新江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www.ewen.com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江蘇金壇古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 × 1240 1/32 印張 13.75 插頁 10 字數 300,000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2,100

ISBN 978-7-5325-6994-6

K · 1772 定價：68.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序

東方文化，範圍至廣。我們今天研究東方文化，不可能面面俱到，處處深入，而必須抓住重點。同時，我還考慮到，闡釋東方文化與弘揚中華文化，實是相輔相成，互為表裏；二者不可缺一。根據這些考慮，我們研究東方文化，在全面照顧的情況下，必須有所偏重，必須有重點，而重點應當放在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上，似乎是順理成章之事。敦煌吐魯番學實應為這樣的文化交流的重點。無論是從歷史上來考慮，還是從地理上來考慮，這似乎是順理成章之事了。必能為海內外方家學者所贊同。

談到敦煌學，我不禁想到先師陳寅恪先生的一段話：

或曰，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其發見之佳品，不流入於異國，即秘藏於私家。茲國有之八千餘軸，概當時唾棄之賸餘，精華已去，糟粕空存，則此殘篇故紙，未必實有繫於學術之輕重者在。

寅恪先生不同意這個看法。他列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中國收藏的敦煌卷子的重要性。他最後的結論是：

但此僅就寅恪所曾讀者而言，其為數尚不及全部寫本百分之一，而世所未見之奇書佚籍已若是之衆，儻綜合

並世所存敦煌寫本，取質量二者相與互較，而平均通計之，則吾國有之八千餘軸，比於異國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讓焉（《金明館叢稿二編》）。

寅恪先生的話是非常有道理的。

但是，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敦煌學又確曾是我國學術之傷心史。在同一篇文章中，寅恪先生再三強調學術預流問題，他說：

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自發見以來，二十餘年間，東起日本，西迄法英，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範圍，先後咸有所貢獻。吾國學者，其撰述得列於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者，僅三數人而已。

在寅恪先生寫此文以後的幾十年中，這種情況基本未變。難道這還不算是“傷心史”嗎？日本、西歐於此道確有成績，我們決不否認。我們自己則由於種種原因，望塵莫及，致遭國外同行的白眼，這也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別人。

最近十幾年以來，特別是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以來，由於領導的重視和全國同行們的努力，情況逐漸有了改變。老一代的學者壯心不已，成績斐然。中年學者，不甘落後，各就自己的研究領域，刻苦鑽研，鍥而不捨，開後學之先路，作中流之砥柱；俯不忤於後，仰不愧於前。如郭在貽、姜伯勤、項楚、李正宇、陳國燦、張廣達等等教授，皆是也。項楚先生最近出版的《敦煌變文選注》，得到了老一代學者呂叔湘等先生的高度贊揚，說“校釋精詳”，“是蔣禮鴻先生《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之後，又一部研究變文語言文字的重要著作”，“稱得上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很有建樹的好書”。學術前輩的欣喜之情，躍然紙上。

青年學者脫穎而出，急起直追。他們對學術表現出非凡的熱情，開電燈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名篇佳作，層出不窮，神州騰譽，海外名播，真如長江後浪推前浪，敦煌之學，頓呈百花鬥豔之勢。這樣的青年學者，頗可以舉出一些來，如榮新江、盧向前、張涌泉、黃征、王素、趙和平、鄧文寬、郝春文等等皆是也。

榮新江，最近若干年來，專根據敦煌寫卷以及其他史料，治西北民族關係史和歸義軍史，已在國內外著名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多有創見。英年如此，前途正未可限量。我對他所研究的範圍，無多通解，不敢贊一辭。我只知道，他用力極勤，搜羅資料，巨細不遺，想在他手下漏網，難如登天。他取得這樣的成績，決非偶然。

我年屆耄耋，成了一個“世故老人”。我國現代學術之興衰、榮辱，皆所親歷。有時感到，一腔熱血，報國無門。現在看到這一批英姿勃發的中青年敦煌學者，雪學術之國恥，著預流之先鞭，中心喜慰，不可言傳。前見古人，後見來者；以吾老朽，尚何所求？是爲序。

季羨林

一九九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前 言

本書題爲“歸義軍史研究”，副題爲“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確切地講是對九世紀後半期至十一世紀前期將近二百年間的以敦煌爲中心的西北歷史的研究。從中原王朝的分期來講，歸義軍跨越了晚唐、五代、宋初三個時段；從地域上來說，其領地涉及河西與西域。正是由於歸義軍處在中原王朝之“王命所不及”的西北一隅，所以在偏重記載中原歷史的傳統史料中對其語焉不詳，《新唐書》和兩《五代史》將之附在《吐蕃傳》中，《宋會要》和《宋史》則列入《蕃夷》和《外國傳》，所記皆極爲簡單。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發現了大約1002年以後不久所封閉的藏經洞，洞中出土了數以萬計的佛典、四部書和公私文書，年代雖說是從五世紀初到十一世紀初，但各個時代寫本的多少比重不同，時間越晚，材料越多；而且文書的內涵也因時代不同而多少不等，時間越後，世俗文書越多，換句話說，就是有關歸義軍的史料最多。

敦煌文書的發現，爲歸義軍史的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礎，但從傳統的歷史學觀點來看，歸義軍研究這一課題似乎過於狹窄。我之所以選擇這樣一個主題來加以討論，是基於以下幾點考慮。

舊史家爲國史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這是我們常常

引以爲自豪的事情。但與之俱來的一個缺點是，今天的歷史研究方向和結論，往往受到舊史家的影響，因爲我們所依據的材料主要是出自官僚士大夫的手筆。敦煌文書提供了一批未經任何史家所竄改的原始資料，我們常常可以通過一個事件發生的當時所遺留下來的材料看這件事情本身，這就可以揭開舊史所掩蓋的一些歷史真相。如歸義軍初期，唐朝所留下的史料較多地渲染張議潮的歸降和獻款，而通過敦煌文書，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張議潮乃至張淮深與唐朝明爭暗鬥的情形，從而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歸義軍作爲晚唐的一個藩鎮與中央朝廷之間若即若離的關係。

歸義軍在唐朝是一個邊遠的藩鎮，五代、宋初則成爲實際的外邦，這是歸義軍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性之一。傳統的史書都是以中央王朝爲主線而加以記錄的，所記多是帝王將相的事迹。敦煌文書中的歸義軍史料，提供給我們研究唐代地方史的多方面資料，而且，從節度使到一般民衆，都有豐富多彩的文獻可供研究。歸義軍時期的敦煌文書，包括許多傳世史料所沒有的胡語文書，還記錄了當地和周邊的各民族的情況，更爲珍貴。可以說，歸義軍史料提供了我們做歷史研究的一個新的出發點，也提供給我們研究歷史的新視角，本書揭示的歸義軍與甘州迴鶻、西州迴鶻之間的戰爭和文化交往史事，就是傳統史料所不及的地方。

在中國歷史的發展中，歸義軍在某些方面有其不可磨滅的歷史地位。敦煌自漢代以來就是中原王朝的邊陲重鎮，特別是經營西域的最重要基地。與此同時，敦煌又是中原戰亂時部分世家大族的避難地。魏晉以來，敦煌保存了許多漢文化的精華，並爲隋唐制度、文化的形成作出了貢獻。經過唐朝

一百多年的統治，這種漢文化更加根深蒂固。然而，自 786 年開始，吐蕃王朝在敦煌統治了六十多年，改變了原來的政治經濟體制，也使當地民衆的語言習俗有了較大的變化。歸義軍成立後，規復唐制，強化漢文化的教育，並不斷吸收中原文化的營養成分，使得漢文化在敦煌乃至河西部分地區鞏固下來。相反，從南北朝到隋唐時代的高昌，雖然也有着強大的漢文化基礎，但經過此後西州迴鶻的長期統治，已經和中原文化基本脫節了。

敦煌不論從地理範圍還是從州縣等級來說，都不能算大，但它位於絲綢之路上的咽喉地段，自漢代以來就是“華戎所交，一都會也”。這裏既是東西方貿易中心和商品中轉站，又是中國文化西傳的基地和西方文化東來的最初漸染地。自漢至唐，敦煌這個國際都會的興與衰是和這一地區和平還是戰亂緊密相關的。唐朝所創造的和平環境，爲敦煌多姿多彩的文化的繁榮提供了保證。在經過吐蕃征服和統治後，歸義軍維持了敦煌地區近二百年的社會穩定而不受戰爭摧殘（短命的金山國除外），使當地的文化得以保存，得以發展。佛教繼續盛行，敦煌莫高窟迎來了一個新的造窟高潮；在中國其他地區基本絕迹的祆教，仍在敦煌進行着賽神活動；這裏的景教徒可以與西州迴鶻的景教牧師自由往來；甚至摩尼教的經典也還完整地保存在寺院的藏書中。藏經洞中保存的那些彙聚各種文化的典籍，也可以說是敦煌保持了一個國際都市面貌的完整體現。這是歸義軍對中國歷史的另一個貢獻。相反，原本較敦煌更具規模的國際大都會涼州，卻就是在這兩百年間衰落下去，戰亂頻仍，不復昔日之盛。

然而，敦煌文書大多殘缺不全，與傳世史籍性質不同。因

此，研究歸義軍史與研究斷代史不同。中國古代斷代史的研究，幾乎都有各代正史、編年史、別史或其他史料可依，大致的脈絡是清楚的。歸義軍史則完全没有詳實的史書可言，敦煌所遺留下來的公私殘文書，數量雖多，但大多是作為佛典的附屬品而保存下來的，所以雜亂無章；而且，文書發現以後又分散收藏在英、法、俄、日、中等國的公私收藏者手中，數萬件寫本没有分類地與佛經、道典、四部書混在一起，研究者要像處理最原始的檔案一樣，首先做文字校錄，將殘文書整理成可讀的文獻，然後纔能參互對比，進行研究工作。

歸義軍史的研究是隨着藏經洞的發現而開始的，而且一直是和對於文書的整理工作同步進行的。如羅振玉《補唐書張議潮傳》和《瓜沙曹氏年表》，輯錄了傳世史料和部分敦煌文書中的歸義軍記載；王重民《金山國墜事零拾》錄出了有關金山國的最基本的文書材料；向達《羅叔言〈補唐書張議潮傳〉補正》大量引用了莫高、榆林兩所窟羣中的供養人題記；唐長孺《關於歸義軍節度的幾種資料跋》考訂了新公佈的倫敦藏卷中最重要的一些歸義軍史料，雖然所見文書不多，但筆路藍縷，厥功至偉。但由於敦煌文書散在四方，前輩學者不免受到時代的局限。即如研究條件遠較中國學者優越的日本京都大學藤枝晃教授，從四十年代以來就撰寫了《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始末》、《敦煌的僧尼籍》、《敦煌千佛洞的中興》、《敦煌曆日譜》等一系列與歸義軍史相關的長篇論文，但最終也未能全部檢索包含世俗文書最多的伯希和所獲文書。自七十年代末巴黎公佈這批文書後，加之此前早已公佈的倫敦藏斯坦因文書和北京圖書館藏卷，我們今天可以看到最主要的三家敦煌收集品，因此，近十年來有關歸義軍的研究論著層出不窮，雖說成果斐

然，但玉石混雜。

我上大學二年級時，恰好巴黎、倫敦、北京所藏敦煌寫本縮微膠卷購入北大圖書館，課下按編號順序檢索寫卷時，就已留意歸義軍史料。1982年上研究生後，在導師張廣達先生的指導下，以“歸義軍及其與周邊民族的關係”為研究課題，開始系統閱讀前人研究成果，並廣泛收集有關歸義軍的各種史料，包括節度使文書、各官府衙門文書、寺院文書、發願文、文學作品、寫經題記、契約等等，本着六經皆史，四庫皆史的精神，抄錄各種文書和史籍資料。1985年，有機會走訪了英、法等國，抄錄了一些縮微膠卷上看不清楚的文書，但所見有限。1986年在《敦煌學輯刊》上發表的《歸義軍及其與周邊民族的關係初探》，即是初步研究的成果。以後又以此文為基礎，重新考慮並系統地研究歸義軍史，陸續撰寫了一些有關的論文。1990—1991年，我又有機會走訪查閱英、法、日、俄四國所藏敦煌文書，見到 S. 6980 以下數千號未刊文書和部分俄藏未刊重要文書，在日本公私藏品中，也有一些新的發現。在此基礎上，對已發表的論文做了全面的修訂，並新撰了一些論文，形成本書的基本結構。

本書重點是探討歸義軍的政治史和對外關係史，大體按其歷史發展的脈絡展開討論。考慮到前人所做的成績，本書並非平鋪直敘地寫歸義軍史，因此每一章節字數不求一致，而以揭示史實為主要目的。第一章用大事年表的形式，給讀者一個我們目前所知的歸義軍主要史事的全貌，並就歸義軍的改元年代一一做了考證。第二章詳細研究歷任節度使的在位年代和其所用稱號的年代界限，目的是建立歸義軍史的年代體系，同時希望用稱號所涉及的大量文書，來確定歸義軍時期

敦煌寫本的年代學。第三至七章是對歸義軍政治史中比較混亂的一些問題的專題研究，從張議潮、張淮深與唐中央朝廷的關係，張、索、李三家政爭，金山國的建國年代，以及曹氏歸義軍首任節度使是誰等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至於曹元德以後的歸義軍，其政治史的脈絡比較清楚，不煩詳述，故此第八章討論曹氏時期的歸義軍與中原的文化交往問題。第九章研究在歸義軍史上不容忽視的佛教教團，重點考察其佛教教學活動和民俗佛教的發展，並就河西都僧統的年代做了考證。第十、十一兩章全面探討了歸義軍與東西方兩支迴鶻勢力的關係，既有戰事，又有文化交往。本書各章節大多曾在學術刊物或論文集集中發表（參看第一章第一節後所附參考文獻目錄），收入本書時，文章的基本結構不變，但做了全面的補充修訂。附錄中的文章，是對有關張氏歸義軍的最重要史料的整理研究，可視作對原始文書加以整理的一個例子。書中所引文書，凡前人有錄文者，選取較佳者注出，但大多經過筆者校對，有些是據原件核定的。書後編製本書所引敦煌文獻編號索引，以便學人參考。

對於歸義軍史的研究，本書只是一些初步的工作，許多課題有待深入探討；而書中所論，也難免有錯，敬希方家教正。

最後，謹向為本書作序的季羨林先生和引導我做此項研究的業師張廣達先生表示衷心感謝；也向為本書出版付出勞動的李偉國、府憲展、蔣維崧先生深表謝意，特別是蔣維崧先生以認真負責的態度，核對了全書引文和編號，改正筆者原稿的一些錯誤，應當銘記於此。

榮新江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北大中關園



作者2013年9月在聖彼得堡

榮新江，1960年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1985年留校任教，現為北大歷史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隋唐史、敦煌學、中外關係史，著有《歸義軍史研究》、《敦煌學十八講》、《敦煌學新論》、《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中國中古史研究十論》、《隋唐長安：性別、記憶及其他》、《辨偽與存真——敦煌學論集》、《學術訓練與學術規範》、《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合著《于闐史叢考》、《于闐與敦煌》，主編《唐代宗教信仰與社會》、《中外關係史：新史料與新問題》、《粟特人在中國》、《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及《唐研究》（1-20卷）。



圖一 S.8516A+C 《曹元忠榜》（第25頁）

故等昨及見底元非是并釋曰天王乃是至善功德意為先捨貪瞋癡
根皆金銀等上還來下界至此方執持香花供養我今其夜到現前
佛法寬廣清淨度元活念亦道無不獲果徑保宣宣門
薄藝梵宇荒中經教不便於根涼論曲廣知於底溪
不惟為懶惰其深之深喻

維大周唐顯慶元年癸丑歲法白廿日三尊寺禪
僧法保自手寫經



圖四 莫高窟第 220 窟新樣文殊圖（第252頁）